

日本與中共關係的檢討與展望

朱少先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由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中共偽總理周恩來，以發表「聯合聲明」方式建立所謂「外交關係」以來，至今已達四年兩個月。在此期間，雙方究竟獲得了多少利益？今後關係又將如何發展？因對亞洲局勢有着莫大影響，值得吾人加以檢討與研究。

對中共得失的檢討

中共與日本建交，可說是中共一次外交陰謀的得逞。我們深知，日本圖謀與中共勾搭，已非一日，但日本身為自由世界的一員，且與中華民國有深厚關係，故始終不敢輕舉妄動。但到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並與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之後，田中內閣便迫不及待的搶先美國，罔顧國際信義與條約義務，與中共建交，墜入了中共預佈的圈套，并使中共赤化日本的陰謀，獲得了極大的進展。

首先由於外交關係的建立，奠定了赤化日本基礎。中共大批統戰能手如蕭向前，米國鈞等以參事身份，坐鎮東京指揮工作。中共並派遣大批人員，從事公開與秘密活動。在東京經常與中共大使館勾搭之友好團體、經濟團體不下三十個之多，中共「大使館」人員與在野政黨，左翼團體及自民黨內親共份子，新聞界亦常有接觸，四年餘來雙方交流訪問之政治、經濟、文化等團體及個人，已高達兩萬人以上。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對共黨內部所作「當前國際情勢問題講話」中，亦曾坦白承認說：「我們對日本的工作現在正在進行着，派遣了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許多代表團去作人民友好的交往，因為日本問題仍是重大的問題」①。足證中共對日本工作，非常積極。尤其是一九七三年五月，廖承志所率領的一個龐大訪日代表團，人數多達五十人，包括了各方代表性人物，逗留日本達三十四天中，足跡遍及包括琉球在內的全日本各重要地區；接觸面之廣亦為前所未有②。據日方報導，該代表團所到各地，均建立據點，散播赤化種子，已為赤化日本打定基礎。該代表團的行動，完全在推進毛澤東所說的「我們同許多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基本上是依靠這些國家的人民，不是依靠這些國家的政府」，「通過和上層接觸，打開到日本人民中去作革命

註① 詳見日本「中央公論」(月刊)第九十一卷十一期(一九七六年一月號)

註② 詳見「問題與研究」第十三卷二期(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出版)拙作「日匪建交後關係的演變與展望」一文。

工作的道路，支持日本人民起來革命」的原則^③。

其次，破壞了中日關係與亞洲反共團結，衝破了對中共防衛上的包圍圈。日本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後，逼使日本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雖然目前中日間仍維持着實質上關係，但在國際政治、國際關係上，使中共獲得有利形勢。且由於日本與中共建交，使東南亞國傍徨無主，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先後與中共建交，使由中、韓、日、菲、泰、星、馬、紐、澳等九國所組成之「亞太理事會」(ASPAC)陷於支離破碎，原有的反共團結，亦遭破壞。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尼克森總統與佐藤榮作首相「華府會談」所作「韓國條款」與「臺灣條款」^④的承諾，至少在表面上已無形消失，解除了對中共防衛上的包圍圈。

再次是擴大了日蘇、日美間的矛盾。當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決定赴中國大陸之前，蘇俄為對抗日美勾搭，其外長葛羅米柯竟於同年一月主動訪日，與當時福田越夫外相舉行一九六七年以來已停止召開了五年的第二次「日俄外長會議」，並獲得了「在一九七二年內開始和約談判」、「兩國首腦互訪」、「加強兩國文化、經濟交流」及「一九七三年舉行第三次外長會議」的協議。但由於日本與中共的建交，一切協議也化為烏有，並造成了兩國關係的疏遠，當該年十月大平正芳外相訪俄時，不僅受到冷落，而且被指責為與中共在亞洲製造霸權。中共更利用機會，煽動日本向蘇俄要求收回北方被蘇俄所佔之國後、擇捉、齒舞、色丹等四個島嶼；並繼續製造及擴大日蘇間矛盾，阻止日本與蘇俄接近。至於離間日美關係，擴大日美間矛盾亦運用得非常巧妙，從邀請尼克森開始，造成所謂對日本的「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改變日本對美「一面倒」外交路線，製造日美間經濟上磨擦等等，使日美關係，受到了很大的損害。

除了上述中共所獲成果外，在經濟上，也取得了莫大利益。中共與日本間貿易往返，一九七二年僅一億美元(日本輸出六億八九〇萬美元，輸入四億九、一一〇萬美元)到一九七三年一躍而達二〇億一、三五〇萬美元(日本輸出一〇億三、九四〇萬美元，輸入九億七、四〇〇萬美元)，一九七四年三二億九、一〇〇萬美元(輸出一九億八、八三〇萬美元，輸入一三億二七〇萬美元)，一九七五年三七億九、二六〇萬美元(輸出二二億六、一六〇萬美元，輸入一五億三、一〇〇萬美元)，四年來已增加三倍半以上。尤其在整套工廠機器設備方面，一九七三年中共輸入乙烯工廠、尿素工廠及火力發電廠等設備共十一宗，一九七四年又輸入鋼鐵熱延工廠等設備八宗，一九七五年輸入整套設備七宗。上項成套工廠設備的輸入，對中共經濟發展，自有甚多助益。

註③ 詳見「昆明文件」該文件是中共「人民解放軍」於一九七三年四月所頒發的一項對部隊「形勢教育」的祕密文件，由「昆明軍區政治部」編印轉頒至連以上部隊，作為對軍事幹部及士兵進行「時事教育」資料。由我國敵後人員在大陸獲得，經由中國情報機構委託「國際關係研究所」譯成英文，連同原件影印成冊，定名為「Chinese Communist Internal Politics & Foreign Policy」作為研究中共之原始資料。本節係引用原書第一八一頁原文。

註④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尼克森與佐藤舉行華府高層會談後所發表「聯合聲明」中，日本為了收回琉球，曾對美國提出對韓國及中華民國安全的承諾。佐藤強調：「韓國安全是日本安全的一部分」，「臺灣地區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上項保證，即被稱為「韓國條款」與「臺灣條款」。易言之，佐藤表示中日韓三國在防衛上是利害一致的。事實上當時以美國為中心，再透過美國與中日韓三國的雙邊同盟條約關係，已構成無形的中美日韓的防衛體制。

無可諱言，中共與日本建交後，除了上述有利的一面之外，亦有其不利的一面。例如在國際關係上，不僅使中共與蘇俄對立更趨尖銳，與美國關係亦益形複雜。同時由於中共邀請尼克森與田中先後訪問大陸並與日本建交，顯示其對外政策前後矛盾，招致大陸人民的懷疑；雖然中共當局透過宣傳、時事教育等方式予以解釋，但仍未能解決大陸一般人民心目中的疑慮。結果形成思想上的混亂與對中共政權的憎惡。更由於日美等國自由人士訪問大陸人數頗多，來往頻繁，大陸人民耳染目睹，所受影響至大。自由思想的啓發，物質意慾的提高及反政府意識的擴大，都是由此而產生。杭州、漢口等地的罷工風潮，天安門暴動，不能不說與此無關。

日本與中共建交是利少弊多

日本與中共建交，係由於受到國際姑息主義的衝擊及國內左翼的壓力、輿論的鼓噪及財界的慫恿所促成。當然田中角榮急於出任首相始與三木武夫、大平正芳成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政策協定，也是重要原因。

但田中內閣與中共建交的結果，並未能達成其預期的成效。衆所週知，田中急於與中共建交的主要目的在獲得執政機會與鞏固政權，以求長期當政。雖然田中在一九七二年七月自民黨總裁競選中擊敗了福田赳夫而當選，但在十二月衆院大選中，却受到了國民的嚴厲批判，議員席次由原有二九七席降到二七一席，喪失了二六席，連黨內以親中共著稱的古井喜實、川崎秀二等均告落選；使田中大感失望。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參院選舉時，田中又恐再遭挫敗，不惜大量揮霍，結果不僅選舉仍遭失敗，且僅能勉強維持半數議席，並落得一個「金權政治」的惡名，三木副總理亦因此與田中反目，退出內閣；最後田中在該年十一月因「金脈事件」而垮台。雖然田中內閣總辭原因甚多，但與中共建交實為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自民黨聲譽的驟降，亦由此開端。

田中內閣與中共建交第二個目的，原期在外交上擺脫美國羈絆，推行「獨立自主外交」；一面希望藉與中共關係的加強，作為對蘇俄談判收回北方四個島嶼的政治資本。但結果已如前所述，不僅與蘇俄談判未獲寸進，反被指為與中共勾結在亞洲製造霸權，成為攻擊目標；亞洲各自由國家，亦因日本不顧國際信義，加深了對日本的疑懼與反感。最後日本仍不得不重返美國懷抱，強調日美關係的重要性。故日本與中共建交，外交上是一個負號。

自民黨內部派系關係雖然複雜，但過去主要的爭執在黨內選舉與內閣閣員分配上，對重要內政與外交政策，幾乎都能尊重黨內決策機構的「總務會」決定。對華政策，自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到佐藤榮作等歷屆內閣，一直採取與中華民國維持正常外交關係，在「政經分離」原則下，與中共維持經濟與文化關係的方針，從未改變。即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森已宣佈決定訪問中國大陸，自民黨內對所謂「日本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運動已進入高潮時，反對力量仍非常強大。田中組閣後雖極力主張與中共談判，但對此等重大問題，仍不敢輕易獨斷獨行。為協商此一問題，曾於七月中旬將黨內「中國問題調查會」改組為「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

會」直隸總裁，由小坂善太郎爲會長，參加各派議員達三百二十餘人。經月餘商討結果，對田中訪問中國大陸與周恩來會談，原則都未表反對，至於如何達成關係正常化，意見就相當分歧；對廢除「中日和約」及與中華民國斷交，大多數議員更表反對，後因田中等已決定九月二十五日起程，「日中國交正常化協議會」不得不於九月八日正式決定了一項「日中國交正常化基本方針案」，並提交黨總務會通過，作爲田中與周恩來談判之依據。該項「基本方針案」原文是這樣的：

「日中關係正常化時，我國政府應遵循左列諸項原則。但特別鑑於我國與中華民國深厚關係，在談判時應充分考慮繼續與中華民國從來之關係。

(一) 日中正常化應基於聯合國憲章、萬隆十原則進行。

(二) 互相尊重不同體制、不干涉內政、尊重與友好國家之關係。

(三) 互相不行使武力及武力威脅。

(四) 在平等基礎上互相努力增進經濟文化交流，不採取差別待遇。

(五) 互相爲亞洲和平與繁榮而合作。」

上項決定已成爲黨的正式方案，作爲田中與周恩來談判的基本方針。九月十一日自民黨「外交問題懇談會」集會時，並推派岸信介前首相及石井光次郎，船田中兩位衆院前議長，親訪田中首相，要求與中共談判時，必須尊重九月八日黨所決定的原則，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從來關係」，並告以所謂「從來關係」，包括「外交關係」在內。^⑤但田中內閣與中共談判建交時，並未遵照自民黨中央決定的原則，且在與中共建交同時，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完全違反了黨的決定。不但破壞了黨決策機構的權威，也造成了親中共派與反中共派的尖銳對立，一時曾使自民黨陷於混亂狀態。

日本與中共建交的另一重大目的，是希望與中共擴大貿易並自中國大陸獲取天然資源，特別寄望於石油的大量輸入。關於這一點，日本多少獲得了一些結果，例如在貿易方面，日本對中共輸出由一九七二年的六億八九〇萬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二二億六、一六〇萬美元，雖然增加了近四倍，但在日本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比率，不過二·五%左右，仍微不足道，距日本理想甚遠。而且自一九七六年起，雙方貿易已有萎縮現象。至於石油，由於西方國家大事吹噓，日本對中共抱有極大幻想，但事實上中共石油產量不多，油質亦差，自一九七三年日本輸入中共石油一百萬噸以來，翌（一九七四）年亦僅四百萬噸，一九七五年爲八百十萬噸。依照日本石油界最初計劃，到一九八〇年每年輸入原油五、〇〇〇萬噸，但因油質與油價問題，到一九七五年底，輸入目標修改爲三、〇〇〇萬噸，今年初再減爲二、〇〇〇萬噸^⑥一九七六年日本「國際石油」與「日本中國石油輸入協會」原定輸入中共原油

註⑤ 詳見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日本「東京新聞」。

註⑥ 詳見日本內閣調查室出版「調查月報」第二四五期第十三頁。（一九七六年五月出版）

八百萬噸，但因中國大陸動亂與天災等迄未按時交貨，預料今年將較去年減少。今後即使能每年供應二、〇〇〇萬噸，以日本每年消耗原油三億噸言，亦僅滄海一粟，對日本助益不大，亦難滿足日本需要，工商界對此已多有失望之感。

日本與中共間所存在的若干棘手問題

一九七三年三月日本與中共正式交換「大使」之後，雙方即積極展開了各種協定的談判，一九七四年一年中完成了貿易、海運、航空等協定的簽訂，漁業協定也有了原則性的協議；表面上雙方關係似已有了若干進展，但實質上，並不盡然。例如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簽訂航空協定後，除了逼使日本一度與我斷航之外，雙方迄今仍僅維持每週兩次的航行；而且乘客寥寥無幾，使日本航空公司每年出現極大赤字。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田中內閣總辭，由三木出任首相，福田出任副首相及宮澤喜一出任外相後，雙方關係即陷入停滯狀態。造成停滯的原因，除了日本內閣人事交替之外，主要的是同年十一月福特總統親訪日本，加強了日美關係以及一九七五年四月越南、高棉的淪陷與中共內部的混亂。加以日本與中共之間，目前尚存在着若干棘手問題，也使雙方關係無法進一步發展。

目前日本與中共間第一個棘手問題是所謂「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問題」。此一問題在一九七二年九月雙方「聯合聲明」中，早已明白規定，爲了發展雙方和平友好關係，同意談判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在田中執政期間，雙方曾多次交換意見，但正式談判，係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初中共「外次」韓念龍訪日時與木村俊夫外相開始，其後由日本外務次官東鄉與中共駐日「大使」陳楚進行實質商談。由於雙方對所謂「反對霸權條款」看法互有出入，無法獲致協議；在中共立場言，「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爲「憲法」中明白規定的基本政策，而所謂「超級大國」係指美國與蘇俄而言，但在中（共）蘇對立，中（共）美和解現狀下，「霸權」對象自然就是蘇俄。而在日本立場，反對霸權是一項普遍性原則，不能針對某一特定國家——蘇俄。因此，如將霸權條款列入條約本文，將被視爲「對蘇同盟」條約，在國際現狀下，日本自不願受到中共牽制，以蘇俄爲敵。結果談判遂告中斷。去（一九七五）年九月宮澤外相出席聯合國大會時曾與喬冠華就此一問題會談，宮澤曾提出對霸權四項基本原則：（一）反對霸權非針對特定第三國而言；（二）雖繼續維持「聯合聲明」精神，但不意味着日中（共）採取共同行動；（三）反對世界上任何霸權；（四）反對霸權與聯合國憲章精神相符合」的解釋。因中共方面堅決主張將霸權條款列入條約本文，日方基於上項原則及蘇俄從中阻撓，自無法同意，故此項條約迄今仍未簽訂。今年九月小坂善太郎就任外相後，雖曾一再表示願意早日與中共簽訂上項條約，但因中共政局迄未穩定，三木政權亦在動盪之中，暫時勢亦無法解決。

日本與中共間第二個棘手問題爲貿易逆差問題。根據日本大藏省通關統計，中共對日貿易逆差，一九七二年僅六、五四八萬美元，一九七四年突然增至六億七、九七〇萬美元，一九七五年爲七億三、〇六〇美元，今（一九七六）年一至六月入超約四億七、〇

○萬美元，雙方貿易不平衡問題，愈來愈趨嚴重，中共爲了彌補對日貿易逆差，只有設法抑制日本進口，增加對日本出口。對於前者，中共在「批林批孔」及「反走資派」運動中嚴厲批評以鄧小平爲首所主張的「四項現代化」，就是反對輸入大量整套機器設備，而主張「自力更生」，也就是要減少自日本輸入工廠設備及鋼鐵等的一種抵抗行動。這些行動，自然與日本利益發生衝突。對於後者，由於中國大陸連年遭受天災，尤其是今年唐山大地震及東北地區冷凍等災害，原油及農產品等輸日大受影響，今年在廣州舉辦的春秋兩季貿易會，亦以產品不足，價格過高及日本國內經濟尚未完全復甦等原因，成交數額僅二億六、七千萬美元故對日增加輸出，前途亦不樂觀，由於雙方利益無法調和，便產生了「日本整套工廠設備無法順利輸出」、「鋼鐵、肥料等輸入銳減」及「中共原油輸日受挫」、「日本限制中共農產品輸日」等棘手問題，甚難獲得解決。

第三個棘手問題，是在美、匪、俄三角關係中，日本如何適應的問題。由於日本是經濟大國，在亞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美國、蘇俄、中共三者爭取的目標。在美、匪、俄三角關係中，日本處境極爲微妙。日本基本國策反共，與美國訂有「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美國對日本有防衛義務^⑦。日本也只有在美國核子傘保護下，始能確保國家安全。美國亦以日本爲亞洲戰略的支柱^⑧。兩者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軍事上有不可分割關係。另一方面，蘇俄與中共要赤化亞洲，日本是主要目標，一九五〇年蘇俄與中共簽訂的「中（共）蘇友好互助條約」，即是以日本爲假想敵的「軍事同盟」；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的韓戰，是進攻日本的序幕；若非以美國爲首的聯軍介入，後果已不堪設想。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蘇俄與中共對立以後，日本所受匪俄共同壓力雖然減輕，但來自蘇俄、中共的各別滲透、顛覆，依然非常強烈。一九七〇年尼克森總統宣佈「亞洲新政策」後，蘇俄爲填補美軍撤出亞洲的空隙，就提出了「亞洲集體安全保障體系」的構想，欲將日本納入蘇俄的安全保障範圍之內。前述一九七二年一月葛羅米柯外長突然訪問日本，足證蘇俄當時深恐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勾搭後對蘇俄不利，始積極對日本展開爭取工作。不久中共也發動邀請田中首相訪問大陸，此舉無疑亦是針對蘇俄爭取日本，破壞日俄關係的一項對抗行動。與中共邀請尼克森訪問大陸，是同一陰謀詭計。中共祕密文件——「昆明文件」中有關邀請田中那一段的解釋，即是它的自供狀。文件中說：

「邀請田中訪華同邀請尼克森一樣，第一是着眼於人民，通過上層的接觸，打開到日本人民中去作革命工作的道路」，支持日本人民起來革命；第二是利用矛盾，具體講，就是利用日蘇、日美的矛盾。爲什麼日蘇日美之間有矛盾給我們利用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單獨佔領了日本，控制了日本，日本在外交上是完全倒向美國的。近年來，國際局勢起了巨大的變化，註⑦ 在「日美安保條約」第三條中規定「雙方在憲法容許範圍內，個別的和相互合作。維持和發展有效的自助和相互援助抵抗武力攻擊的能力」。在第五條中又規定「在日本所轄領土內任何一方遭到武力攻擊而認爲已危害和平與安全時，依各自憲法規定採取共同行動」。但該條約中並未規定日本有防衛美國之義務。

註⑧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美國總統福特訪問北平後於十二月七日經夏威夷時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發表了「與所有國家和平相處而不對任何人爲敵」(Peace With all and hostility toward none)演說，正式宣佈了他的「新太平洋主義」(A new Pacific Doctrine)六項要點，其中第二項即「與日本的伙伴關係是美國的戰略支柱」。

爲了適應這個變化，日本想逐步改變對美一面倒的外交，推行自由多邊外交路線；在日蘇關係上，日本堅持要歸還北方國後、擇捉、齒舞、色丹四島，與蘇修講價錢。既然日本想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增加同蘇修談判中收回北方領土討價還價的資本，那麼他們不得不對我們作一些表示。我們就抓住他和美蘇的矛盾加緊工作，做好這一工作對我們是大爲有利的，對美帝、蘇修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爲日本戰略位置很重要，美帝、蘇修這兩個強盜，不管那一個，要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都必須拉日本充當打手。美國想利用日本作侵略中國的跳板，日本是美帝對中國月形包圍的重要環節；蘇修也想把日本作爲對我們發動侵略的橋頭堡，他千方百計地拉日本參加他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對我國實行圓形戰略包圍。另外，日本同臺灣關係十分密切，對美帝在亞洲的一些走狗有一定的影響，我們偉大領袖毛××高瞻遠矚，決定邀請田中首相訪華，決定和日本建交，緩和了中日關係。毛××這一步棋，粉碎了美帝、蘇修對我國的戰略包圍陰謀，有利於我們和平解放臺灣，有利於改善我們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緩和了亞洲和國際緊張局勢。由於我們和日本改善了關係，日本有了同美蘇討價還價的資本，胆子更大了，這樣日美、日蘇的矛盾將進一步加劇，我們又可以繼續利用他們的矛盾，進一步做好工作。⑨

日本與中共建交之後，日蘇關係便出現了緊張的局面，恢復了不接不離的狀態。一九七五年一月宮澤外相訪蘇及同年九月葛羅米柯訪日，日蘇關係雖趨緩和，但北方領土問題與日俄和約問題，仍毫無解決跡象。中共還不斷利用機會，祕密煽動及公開支援日本人民，要求收回國後、擇捉、齒舞、色丹四組島嶼，製造及擴大日俄間的矛盾。今年七月九日宮澤外相曾爲此事發表談話，表示不歡迎第三國干與日俄間有關領土問題的爭執而遭到中共的攻擊。顯示日本與中共、蘇俄三者間，關係複雜微妙。

此外，日本深知其自身安全，與韓國及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安全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日本當局一再呼籲美軍勿自韓國撤退，以免喪失朝鮮半島之均勢，影響整個亞洲安全。對臺灣問題態度，雖極爲審慎，儘量避免提及，但本年七月十二日宮澤外相接見美國參院多數黨領袖曼斯斐德時，仍坦率表示過不希望目前美國與中共關係的現狀，有激烈改變；對於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則普遍表示反對。由日本國會議員一百多人組成的「日華關係懇談會」，最近亦曾分函美國參眾兩院，勸告美國應慎重處理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尤其反對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否則亞洲局勢將爲發生激變，這都說明了日本朝野都關心韓國與臺灣的前途。而這兩個地區，又都與中共有密切的關係，尤以日本對美國與中共關係所表示的立場，更牽涉到中共本身的利害，自然使中共深表不滿。諸凡上述日本在美匪俄三角微妙關係中的處境，也構成了日本與中共間不易處理的棘手問題。

日本與中共關係的可能發展

中共自周恩來死亡，繼之發生天安門暴動事件及鄧小平被黜，由華國鋒出任「總理」；不久毛澤東又告斃命；接着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四人幫」被捕整肅，大陸局面一片混亂。雖然華國鋒已被推為「主席」，但各地反華運動正在蔓延，顯示中共政權，迄未穩定，隨時有發生突變可能。最近華國鋒以下中共頭目一再表示對外政策不變，對早日簽訂「中（共）日和平友好條約」方針亦未改變，惟由於中共黨政人事尚未安定，喬冠華「外長」已被整肅駐日「大使」陳楚亦被調回，所以中共對日政策究竟將如何發展，尙難判斷。

在日本方面，衆院議員大選將於十二月五日舉行，雖然一般預料自民黨在未來衆院五一一席中獲得二分之一席次，繼續維持政權，不致有多大問題，但由於自民黨內部三木派與反三木競爭非常激烈，加以受「洛克希德賄賂案」影響，但欲取得「安定多數」議席^⑩恐有困難，即使獲得繼續執政，在大選後改選新首相時，三木與福田之爭，亦在意料之中。如果因三木派與反三木派無法取得協調，甚至鬧到三木派脫離自民黨，最後出現「保守聯合政權」或「保革聯合政權」也非毫無可能。因此，日本此次大選結果及自民黨內部能否繼續團結，對未來政局影響極大，所以未來日本對外交政策，尤其是對中共政策將如何演變，亦甚難逆料。基於上述中共與日本當前政治情勢均極不穩定，要展望未來雙方關係如何發展，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

現在先假定中共對日本維持原有政策為不變因素，亦即是假定華國鋒體制暫時尚能維持一個比較穩定局面，而且繼續執行毛澤東的所謂「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⑪對蘇「對立」與對美「和解」路線也不致作重大變更。則中共對日本政策，預料亦不致改變。在此情況下，中共與日本的關係，我們可從政治與經濟兩方面來加以推測。

在政治關係方面，中共基本政策既未改變，則雙方未來關係發展，要看日本新執政者為誰以為轉移。如自民黨繼續執政，而三木仍能出任首相，小坂善太郎續任外相，基於三木、小坂過去與中共的關係及最近兩氏的言論，日本與中共關係，可能進一步加強，所謂「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亦有簽訂可能。如果由福田赴美出任首相，料將對中共採取較堅定態度，而不致處處遷就中共。對於類似「反對霸權」等問題，必將基於聯合國憲章精神，以普遍性原則加以處理，除非中共讓步，「和平友好條約」極難締結，雙方關係將繼續停滯而維持目前狀況。如果自民黨喪失執政機會而成立「保革聯合內閣」^⑫，則日本與中共關係更將接近且可能迅速發展，加速日本赤化。

在經濟關係方面，最近中共「副總理」谷牧對「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藤山愛一郎等之發言，「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主任註^⑩ 日本衆院議員現已增至五百一十一人，過半數為二百五十六人，但衆院有十六個委員會，設有十六位委員長，自民黨欲在每個委員會中均佔半數以上，最低席次為二百七十一席，如獲得二百七十一席以上，即為「安定多數」。

註^⑪ 「新華社」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所報導華國鋒在追悼毛澤東大會上致悼詞中曾說：「……在國際，我們一定要繼續堅持貫徹執行毛××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革命主義，永不稱霸」。

註^⑫ 「保革聯合內閣」指保守政黨與革新政黨聯合組織內閣之意。

王耀庭對「東京銀行」總經理橫山宗一等之談話及「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與日本中部地方經濟訪問團會談時之發言，均一致指出今後中（共）日經濟貿易關係，將順利發展。又本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及「紅旗」雜誌以「歷史的偉大勝利」為題發表共同社論時，特別指出：「在華國鋒體制下，中共在本世紀內將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近代化」^⑬，顯示中共今後正朝向恢復「四個現代化」目標推進。在此情況下，中共與日本經濟貿易關係，自將有擴展可能。但在現況下究竟能擴大到何種程度，仍值得懷疑。不過中共與日本的經濟關係，主導權操於中共，日本無論由誰執政，對發展與中共經濟關係，目標是一致的。

總之，日本與中共關係，目前極不穩定，未來發展究竟前進抑或後退，主要要看雙方政局演變而定。至於日本在美匪俄三角關係中所處地位，在三者維持均勢狀況下，日本自必採多元外交來求自保；一旦均勢發生變化，日本仍將站在美國一邊，與自由世界合作，自可斷言。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卅日脫稿）

註⑬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日本「讀賣新聞」。

泰國新政府與共產國家關係評估

羅石圃

對內堅決反共的泰國新政府，將在外交上不再取悅于共產國家，立場已相當顯明。共產國家將如何報復？它們與泰國的關係將惡化到何種程度？是否會使泰國成為下一張倒下的骨牌？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尋求答案。

一 放棄親共外交的訊號

今年十月六日，泰國軍人政變，乃由于民主政府無法鎮壓左翼學潮，且對他們的要求處處遷就，在姑息養奸的氣氛下，使共黨所操縱的學潮日益變赤，國家已走向赤化邊緣。愛國的學生與民衆團體面對左翼學生的猖狂無忌，以及政府應付學潮的軟弱無能，乃自動奮起對抗，以示威對付示威，但其結果，反而造成社會更加混亂，在無政府狀態下，適足以增加赤化的危機，致使軍方不得不起而接管政柄，在泰寧博士受命組閣時，其所發表的五大施政目標，便是以排除共產主義威脅為第一。可見泰國新政府的內政政